

思想文庫

文 学 与 思 想 丛 书

后 现 代 主 义

〔法〕让-弗·利奥塔 等著

赵 一 凡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思想文库·文学与思想丛书

后现代主义

[法] 让—弗·利奥塔等著

赵一凡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主义/(法)让·弗·利奥塔等著;赵一凡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

(思想文库·文学与思想)

ISBN 7-80050-403-4

I.后… II.①利…②赵… III.后现代主义-文集
IV.110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3085 号

思想文库·文学与思想丛书

后现代主义



著者:[法]让·弗·利奥塔等

译者:赵一凡等

责任编辑:郭纪

责任校对:昆鹏

封面设计:郭健 吴伯凡

责任印制:盖永东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张:8.25

字数:191千字

版次: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7-80050-403-4/I·41

定价:1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的话

现代世界充斥着各式各样批量复制的图像。现代人越来越习惯于用直观的视觉符号来激发自己的感觉，人与世界、与他人的接触，常常被轻便地置换为人与数量繁多而格调单一的图像的接触。大批量复制的标准化图像语言使人失去了私语和默然会心的机会。在文字语言被逐向边缘，写作让位于制作，人与人的交往语境呈现出“辉煌的轻松”的时候，语言（连同世界）的沉重感从人的感知领域中淡出，人的心智再也不必在语言的困境中经受磨炼。世界对于人和人对于世界的相互生成已不再可能，世界和人也因此都被最大限度地抽象和简化。这一状况既可以看作是文学衰落的原因，更可以看作是文学衰落的结果。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起自然生态的危机，却很少有人关心文化生态的危机。事实上人类面临的后一种危机不仅远比前一种危机严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后一种危机就是前一种危机的起因。海涅临死前担心那些无知的人们会恣意地砍伐他的“桂树丛林”，在那里种植土豆，担心他们将扯下他的诗页来包起他们的花生米。事实上，20世纪以图像的超量繁殖为特征的文化工业恰好可以理解为土豆的种植业和花生米的包装业。现代文化工业始终在做同一件事——将沉重的文字降解为失重的图像语言（使之成为图解性的语言），以缓解甚至消除语言的沉重性给人造成

2 后现代主义

的压力和紧张。

在图像文化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落实为“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就是一种拒绝“图像化”的勇气。真正的作家在他所处时代的语境中同时性而非历时性地“被缚”和“被解放”,同时性而非历时性地担当着“罪犯”和“立法者”。他“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所以是他是一个“翻译者”(translator);他又超凌于日常生活的法利赛化、图解化语言的语法之外,所以他又是一个“叛逆者”(traitor)。毋宁说,他以“叛逆”实施着他的“翻译”,又以“翻译”发动着他的“叛逆”。他(通过他的作品映现出来)的自由看似“轻松”(light),实为“战斗”(fight),而这种“轻松”和“战斗”交织着的状态就是“飞翔”(flight)。

所以,诸如“作家需要不需要思想”或“过多的思想是否会干扰作家的创作”之类的问题实为无谓的问题。作家的写作就是一种“入思”(thinking)的方式,一种把语言带向语言的行动。只有那些醉心于花言巧语者或插科打诨的人才会专事所谓纯粹、自由的写作,也只有那些沉溺于概念游戏的人才会专事所谓纯粹、自由的思想。拒绝思想就是拒绝文学,反之亦然。一个负责任地构思和写作的作家必定同时就是他自己的批评家。作为语言的受难者,作为在语言上竭尽全力与自己作对者,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同时性地“被缚”和“被解放”,同时性地担当着“罪犯”和“立法者”的角色。所有的文学有着共同的血缘——“作为语言的语言”。语言在本质上的非私人性和共契性(无论它显得多么私人化,无论这种共契性多么幽深)决定了作为自己的“罪犯”和自己的“立法者”的写作者潜在地成为他人的“罪犯”和“立法者”。同样道理,所有的自我批评、自我阐释和自我遭遇都潜在地是对他者的批评和阐释和与他者的遭遇,反之亦然。

《文学与思想》丛书第一辑推出的六种书是在本社已出版的

《世界文论》(1~7)的基础上重新编辑而成的。每一种书都辑录了一批世界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论,每一种书也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这些文章中,有作家对自己的作品阐释和对自己创作经验的陈述,有多位作家、评论家对于某位文学大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的各具特色的评论和阐释,也有当今世界上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文学思潮(如日内瓦学派、布拉格学派、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的代表文献。

很难说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不存在思想和写作技巧上或显或隐的浮皮潦草、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的倾向。可以说,在某些写作圈子中,这些倾向甚至还相当严重。对外国文学在技法、构思、甚至信仰上的摹仿,以及随后的自我摹仿和相互摹仿,对图像传媒的倾心,对市民情调的刻意奉迎,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的劣质化写作态势。正如有人已经看到的,在当代文学中,“潇洒文人的小品话语”、“急切地改变生活质量的市民作家的媚俗话语”、“醉心于修辞练习的先锋小说家的新潮话语”已汇成一种不容忽视的暗流。

这种种话语得以汇流成势,不能说与中国作家的知识旨趣和受教育程度毫无关系。毕业于大学中文系的作家和批评家逐渐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主力,但长期以来大学中文系僵化的教学体制和陈旧的课程设置,不仅造成中文系毕业生在知识类型和知识品质上的明显缺陷,还导致他们对自己的知识身份、社会角色缺乏清醒的定位。

我们相信,我们此次推出的这批文献,将能使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们相对切实地感受到他们热衷于摹仿和谈论的作家和批评家们的知识类型和知识品质。这些文章的具体结论是不值得过分留意的,值得留意的倒是他们无法说出的某些东西以及他们竟然以那样的方式说话。

编辑委员会(姓氏笔画为序)

王逢振	吕同六	吴元迈	沈恒炎
张耳	张玲	张捷	陈桑
赵一凡	郭宏安	郭家申	钱善行
盛宁	黄宝生	章国锋	董衡巽
谭立德			

主 编 钱善行

副主编 谭立德

目 录

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简介	1
[法国] 让-弗·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2
[法国] 让-弗·利奥塔	
呈现无法显示的东西——崇高	18
[德国] 曼·弗兰克	
正在到来的上帝	27
[德国] 沃·威尔什	
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	43
[美国] 弗·詹姆逊	
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50
[美国] 安·史蒂芬森	
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的一次谈话	83
[美国] 伊·哈桑	
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	111

[美国] 艾伦·泰尔	
伊·哈桑眼中后现代主义的进化	130
[法国] 朱·福柯	
《知识考古学》导言	135
[俄罗斯] 马·利波维茨基	
陡度的规律	157
[俄罗斯] 维·库利岑	
后现代主义：一种新的原始文化	197
[俄罗斯] 亚·沃朗斯基	
观察世界的艺术——谈新的现实主义	215

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简介

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是当代文艺思潮之一, 本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 不久波及德国、日本, 在前苏联及其它国家也有所反应。一般认为它与自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不同。有人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反拨, 有人认为是现代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是进入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危机的产物。后现代主义问题涉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和西方及前苏联文化、文学倾向的认识和评价, 是一个有关全局的问题, 因此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们对它也应该有所了解。关于这个思潮的起源、发展、它同现代主义的区别及其内部多家不同观点的论争, 我国袁可嘉先生在《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国外社会科学》, 1982 年第 11 期)一文和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 年)一书中已作过简明扼要的介绍。这里译载的, 是美、法、德、俄诸国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的该思潮同文学艺术关系较密切的几篇文章, 观点和侧重面很不一样, 却都是专家选取的代表作, 读者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其近二十年的情况。所选文章按原文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

让-弗·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①

导 语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有关最发达社会里的知识状态。我决定以后现代一词表述这种状态。该词目前在美洲大陆的社会学家和批评家中间颇为流行，人们用它来指示我们眼下的文化处境：历经 19 世纪末以来的多重变革，从科学、文学到艺术的游戏规则均已改换。本书试将上述变革置于叙事危机的范围内加以考察。

科学始终同叙事发生冲突。依照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大部分叙事不过是寓言传说。但是，科学除了在陈述有用常规和追求真理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它仍然不得不证明自己游戏规则合法性。于是它便制造出有关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即一种被叫做哲学的话语。我将使用现代一词来指示所有这一类科学：它们依赖上述元话语来证明自己合法，而那些元话语又明确地援引某种宏伟叙事，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例如，按照理性的双方可以达成一致意

① 这里选译的是《后现代状态》一书中的导语、第 8 节和第 10 节，以便读者窥见其中知识合法化问题的变化动向。

见这一观念来判断，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陈述者和倾听者之间导致共识的规律便能够成立：这就是启蒙叙事，在这类叙事中，知识英雄总是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宇宙的和谐迈进。从此例可以看出，如果利用暗含着一种历史哲学的元话语去证明知识的合法性，随之引起的疑问便将是有关那些支配社会制约关系的机制的合法性，它们本身也需要合法化证明。因而正义同真理一样都受到宏伟叙事的关照保护。

用极简要的话说，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这种不信任态度无疑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科学进步反过来又预设了这种怀疑态度。与合法化叙事构造瓦解的趋势相呼应，目前最突出的危机正发生在思辨哲学领域，以及向来依赖于它的大学研究部门。叙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运转部件，包括它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目标。它逐渐消散在各种叙事语言因素的迷乱星云里，其中搀杂着叙事、指示、命令、描述等等成分，而每一星云又依照它自身独有的语用学规律进行旋转。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众多星云的交接面上。然而，我们无需建立稳固的语言组合，已建立的组合体制也不一定发挥交流作用。

未来的社会因此将不大可能落入牛顿式人类学的规范（诸如结构主义或系统理论），反而会遵循一种语言粒子应用学的规律。语言游戏层出不穷——具有多种成分的异质生成性质。它们只能导致机制的分解——即局部决定论。

但是，决策人物企图按照输出/输入原理来管辖那些社会性语言星云，他们所追随的逻辑是：所有的语言因素都可以通约，因而整体也是能够被决定的。他们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计量分配以促进权力的增长。不论是在社会正义还是在科学真理问题上，这种权力的合法化都同样地建立在优化系统操作——即效益的基础

上。将这一标准运用到我们全部的语言游戏中，必定会带来某种恐怖裁决，它或软或硬，迫使语言要么将自己操作化（可通约），要么自行消亡。

极限操作逻辑当然常常自相抵触，尤其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引起矛盾：它同时要求较少量劳动（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较多工作（为减轻失业人口的社会负担）。可我们的怀疑态度如此强烈，以致我们现在不再象马克思当年那样，期待着从成堆的矛盾反常中升腾起拯救之光。

尽管如此，后现代状态不等于幻灭，正如它不等于对非合法化的盲目肯定那样。元叙事衰亡之后，合法性将在何处安身？操作标准属于技术范畴，它同真理或正义的判断无关。合法性是否如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将会在经过讨论而得出的一致意见中出现？这种意见的同一性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变性，而创造发明总是起源于争辩分歧。后现代知识并非仅仅是权威手中的工具；它增强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促进我们对不同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它的原则不是专家的同一推理，而是发明家的谬误推理。

这里的问题是：一种社会制约的合法化，一个公正的社会，是否能依照类似于科学活动的反论形式建立起来？而这一反论又是什么？

以下的本文是篇应时之作。它作为对最发达社会中知识状态的报告，应魁北克省大学理事会主席之请向该会宣读。我在此感谢主席先生允许发表报告的盛情。

需要补充一点，即本报告的作者是哲学家而非技术专家。后者知道他懂得哪些事物和不懂得哪些事物。前者却做不到。于是人们下结论——说原因是两种极不相同的语言游戏。我在此把它们混为一谈，结果便是无一圆满成功。

可哲学家至少能自我安慰地设想，本报告的基础成分，即有关某种合法化的哲学和伦理—政治学话语的形式与应用分析，今后终归会降临人世。到那时，这份报告便可作为一种社会学角度的前导说明，既缩短详尽分析的篇幅，又同时设定了它的范围。

为此，我将报告题献给巴黎第八大学（即 Vincennes）哲学理工学院，——在这高等学府穷途末路的后现代时期，该学院正可以开创新起点。

叙事功能与知识合法化

如今，合法化问题已经不再被当作是科学语言游戏的一项失败。更为精确的说法是，它作为问题已将自己合法化了，就是说，它已变为一种启发式推动力量。但这种首尾颠倒的处理方式仅仅是最近的事。在它落入这一步之前（即某些人称作实在论的阶段），科学知识曾经寻求过其他解答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在一个长时间内不得不求助于公开或隐蔽的叙事知识程序，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叙事知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返回到非叙事知识中的动向，不应被认为是过眼烟云，一去不返。请看这一赤裸证据：每当科学家有所“发现”，应邀发表电视讲演或接受报刊记者采访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追述一部知识的史诗，而这史诗毫无史诗味。他们按照叙事游戏的规则玩弄科学，而叙事的影响不但明显作用于电视观众，也左右着科学家自身的情绪。这一事实既不琐碎，也不是附加的花絮：它直接涉及到科学知识同“通俗”知识（或者说是它的残余物）之间的关系。国家花费巨资让科学像史诗那样公开上演：这意味着国家本身的合法建立在史诗之上，而

国家则要利用史诗获取决策者们所需要的公众赞同。^①

可以设想，向叙事回归是种必然动向。至少科学语言游戏在追求真理性陈述的同时，没有方法和能力来使得它们的真理依靠自身证明自己合法。假如确实如此，就有必要承认，历史自有一种不可缩减的需要，这需要不像前面所认为的——只是为了记忆和表达（即历史性和叙事口吻的需要），恰然相反，历史的这种需要是忘却〔metrum〕（参见第六节）。

我们正在超过自己。但在前进途中我们应当牢记，有关合法化问题的那些明显被废弃的陈旧解决方案在原则上并未过时，仅仅是在表述方面失败了。如果发现它们以其他形式延续至今，我们也不必惊讶。难道我们自己此时此刻不也正痛感有必要在西方建立一种科学知识话语，以便澄清它的暧昧地位？

科学的时新语言游戏将其合法化问题置于先河初开之处——柏拉图。这里不便对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作详细解释，但科学语用学正是在这本书里开始起步，当时它一半被当作是明晰主题，一半是含蓄的假定。这种对话游戏，加上它特殊的规定，实际上凝聚了科学语用学的精髓，并包括了研究和教学两种功能。我们从中重新见到部分前面已列举的同类规则：如争辩的目的是达至共识〔homologia〕；指谓的统一性保证一致同意的可能；对话参与者相互平等；甚至非直接地认可对话为一种游戏，而无关命运前途，因为那些拒绝接受规则的人（或因懦弱或因粗鲁），都已被排除出圈。^②

① 关于科学家的意识形态，参见《幸存》〔Survivre〕杂志第9期（1971），后重印于尧伯和列维-勒布隆编《科学的（自我）批判》，第51页往后。该书尾附有索引，列举各杂志和团体争论科学如何从属于国家制度的情况。

② 维克多·哥德施密特：《柏拉图的对话》，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47。

余下的事实是，即使我们承认游戏具有科学性质，有关它本身合法性的问题也肯定存在于对话提出的问题之中。与此有关的一项著名例证见于《理想国》第六、七两章，并由于它从一开始即将合法化问题同社会政治权威相联，这例证更显得重要。如人皆知，书中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是以一种叙事形式出现的——即采用穴居时代的寓言形式，追述古人是怎样又为何渴望着叙事，同时又忽略了知识的辨认。因此，知识本来是建立在它牺牲自我的叙事基础之上。

更有甚者。这种合法化努力或柏拉图对话正是凭藉它自身的形式推动叙事发展：每篇对话都套用一种科学研讨的叙事方式。辩论的记载文中表白多于报告，陈述多于叙述这一特征在此无关宗旨，^①因而文体更近似于悲剧而不太像史诗。事实说明，开创科学先河的柏拉图式话语自身就不科学，这恰恰反映在它力图证明科学合法这一焦点上。科学知识不可能知道或让人知道它是真理性知识，除非它求助于另一种知识即叙事知识，但从科学知识的眼光看，叙事知识根本就不算知识。不向叙事知识求援，科学便处于一种假定自己合法的位置，并屈从于它所谴责的毛病：易招非议，依赖偏见。然而，若把叙事当作自己的权威，科学岂不也会落入同样的圈套？

这里不能细致说明叙事在科学中通过后者的合法化话语再度复兴的经过，这一复兴过程包括但又不局限于那些宏伟的古代、中世纪和经典哲学。一场无尽的折磨。即使是笛卡尔这样信念坚定的哲学家，也只能通过瓦莱里所谓的心灵说来证明科学的合法，^②

① 这里的叙事学术语借用了热奈特的《修辞学》第3卷中先例。

② 保尔·瓦莱里：《达·芬奇方法引论》（1894），加利玛出版社，巴黎，1957。英文本见杰克逊·马修斯编《保尔·瓦莱里全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6~1975，第8卷。

或在别处以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形式进行这一论证——他那本《方法谈》作用大致如此。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众多哲人里最具现代意识的一个,他区分了推理[Organon]和思辨[Metaphysics],即将科学陈述必须遵循的规则同它们在有关存在的话语中寻求合法性的努力分离开来。他更为现代的建议是将科学知识(包括它假装要表现指谓的存在含义这一点)仅仅看作是争论和证据——或者说是辩证法的构成。^①

伴随现代科学发展,合法化问题中出现了两个新特征。首先,科学超越了对第一证据或先验权威的思辨追求,将它简化为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你如何证明你的证据?”或者更笼统些:“由谁来决定真理的条件?”人们已承认真理的条件或科学游戏的规则是游戏内部所固有的,它们只能在具有明了科学性质的有限辩论范围内加以确立,而且除去专家们自己就此达成的共识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些规则的合法有效。

以一类专究真理条件的话语来限定一类话语的条件这种现代癖性,是与第二个特征一道出现的。这就是叙事(通俗)文化重获尊严,它已表现在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各种启蒙思想支系之中,譬如“狂飙突进运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及法国历史学派。叙事不再是合法化过程中偶然的失误。在知识困境中转向求助于叙事的明显趋势,是与资产阶级要求从传统权威下争取解放的潮流同时发生的。叙事知识在西方发起一场暴动,以便解决新权威的合法化问题。在此叙事复杂化形势下,合法性命题便自然而然地征求一位英雄的名义并以它作为自己的反应:谁有权利来决定社会问题?谁是规定准则并强制遵守的主体?

① 彼埃尔·奥本克:《亚里士多德的存在问题》,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62。